

村庄“微治理”中新乡贤的作用发挥及启示

——以泗泾村“金大哥”为例

庄亚豪¹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积极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期待新时代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回归,并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微治理”作为一种乡村治理有效化、网格化的创新,新乡贤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浙江省嘉兴市广陈镇泗泾村“金大哥”为例,通过阐述其在“微治理”中的主要实践,进而从凝聚乡邻、整合资源、反馈民情、提供服务等方面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新乡贤在“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并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新乡贤 微治理 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长久以来,我国的基层治理模式以政府自上而下的“包办式”治理为主,但这样的治理模式是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政府和群众的“双输”窘境。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换句话说,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随后,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从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了对构建多元治理模式的探索,而“微治理”作为一种乡村治理有效化、网格化的创新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

“微治理”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强调治理单元的下沉,在小规模的生活空间内,以“微组织”为基础,以“微平台”为载体,以“微服务”为手段,以“微机制”为动力来满足基层群众的公共需求^[3]。为满足群众的“微需求”,乡贤在“微治理”中的“软力量”不容忽视。乡贤自古就在地方自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4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强调,“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4]。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积极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期待新时代新乡贤在基层治理中的回归,并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在农村空心化、道德秩序日益崩塌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在应对农村发展中的需求时的无力感也为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可能^[5]。

为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研究新乡贤在村庄“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对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将以泗泾村“金大哥”为例,阐述其在“微治理”中的主要实践,并且结合具体案例,分析新乡贤在“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以期为当前新乡贤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探索出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的有效途径,从而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最大价值。

作者简介:庄亚豪(1996—),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

1 新乡贤的变迁：新乡贤的概念

乡贤自古以来就是与“德”和“才”息息相关的，但随着时代的更替，赋予乡贤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在传统社会中，古代中央政权为维护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统治，必须依赖乡村的“内生型力量”，而乡贤正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传统的乡贤一般是指在科举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乡村并有较高地位者^[6]。他们根植于乡村，与乡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作为乡村与国家之间的中介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7]。他们维护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来引领乡村的基层建设和民风教化^[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政府也越来越重视乡贤在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刘奇葆提出，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可被称为新乡贤，他们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之间拥有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威望^[9]。官方的说法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也掀起了对于新乡贤概念的研究热潮。新乡贤所包含的许多内涵脱胎于传统乡贤，这是由于当代社会中主流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一脉相传。但与传统乡贤不同，新乡贤的“新”主要体现在：第一，“新”的空间分布，传统乡贤产生于较为封闭静止的乡土社会，具有很强的地缘性^[10]，而新乡贤突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并不一定是乡村的本地人，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在土”“离土”和“舶来”等类型^[11]，可见其呈现出新的空间特点；第二，“新”的评价标准，传统乡贤一般是平民之上的中间层级，有较强的道德威严以及政治素养^[12]，而新乡贤更偏向平民化，强调对当地所做出的实质性贡献^[13]；第三，“新”的价值引领，传统乡贤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为导向，教化村民，净化乡风，而新乡贤则是与时俱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14]。因此，新乡贤所包含的主体范围更广阔，更平民化。他们能够弘扬新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念，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取得一定成就或者热心于服务农村社会的发展的精英群体，例如大学生村官、企业家、党员、社会团体的领导者等。

2 新乡贤的参与：结合案例探究新乡贤的作用发挥

新乡贤作为“微治理”机制中的领头人，深入群众，热心公益，为群众提供互助式的“微服务”，从而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微需求”。本研究将以泗泾村“金大哥”为例，探究其在村庄“微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分析新乡贤在“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2.1 案例概况

泗泾村位于广陈镇东部约 2.5km，南临盐船河与三兴相望，东与新仓秦沙村相接，北与山塘村相连，西与港中村相依。村域面积 4.75km²，耕地面积 311.33hm²，辖 14 个村民小组，在册户数 669 户，户籍人口 2334 人。村党总支下设 3 个党支部，3 个党员先锋站，共有党员 81 名。近年来，先后获得浙江省善治示范村、浙江省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浙江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嘉兴市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嘉兴市“三治融合”示范村、嘉兴最美志愿服务村、嘉兴市优美庭院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金大哥作为广陈镇泗泾村 5 组的一员，既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有着五年军旅生涯的退伍老兵。从 2001 年起，他从事保安一职，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了 20 年，在休息时间他总是不着家，忙于关心村里的残疾人、老年人和生活有困难的人，急人所急，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是远近闻名的热心肠。2016 年 5 月经村推荐，金大哥成为了泗泾村 5 组的小组长。成为小组长后，他不断激发和创新工作能力，坚定不移地为公益事业做贡献。例如，村里的老人体检不方便，他就自费包车为老人打通体检路；疫情期间，他想尽办法采购防疫口罩分发给村民。在其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与他的亲戚朋友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并自发成立爱心队伍，后在镇政府帮助下，以这批爱心队伍为基础，成立金大哥工作室，于 2021 年 6 月正式揭牌，为组内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曾获得嘉兴市优秀共产党员、嘉兴市最美抗疫老兵、嘉兴市最美微网格长等称号。

2.2 金大哥在村庄“微治理”的主要实践

2.2.1 提供公共服务

在服务群体上，金大哥不仅为普通村民提供便民服务，也为村里的特殊弱势群体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比如残疾人、老人等。在服务内容上，不断拓展服务内容和手段，依托金大哥工作室，为村民提供多样化的基础社会服务，并且也会为组内村民开展公益教育活动，例如残疾人运动会、探望敬老院老人、防诈骗讲座等，组织村民积极参与相关讲座和游戏活动，不断充实组内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2.2.2 调解村民矛盾

在乡村生活的环境中，村民彼此之间相互熟悉，有着大家都认可的公序良俗与处事方法。金大哥热心公益，作为村民的一分子，在村民间拥有良好的道德威望，相比村干部，组内村民们更能接受由金大哥来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更乐意寻求金大哥的帮助。

2.2.3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近年来，泗泾村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包括垃圾分类、房前屋后整治、农村户厕、优美庭院等内容。金大哥组织志愿服务队伍，针对不同内容开展相关的环境整治服务，并且注重宣传，积极引导村民共同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乡村的人居环境。

2.2.4 培育内生力量

金大哥以金大哥工作室为依托，开展面向组内村民的公共服务活动。在其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发现和挖掘其他有意愿、有能力的村民，从金大哥的家人到朋友，再到其他组内村民，感染带动更多的组内村民关注和参与到公共服务和村级公共事务中。

2.3 新乡贤在村庄“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

2.3.1 凝聚乡邻，发挥村民“微力量”

新乡贤生活于乡村，情系于乡村，在村民中拥有较高威望，并且通过自身的威望感召村民，将村民“微力量”凝聚在一起，共同参与乡村公共建设。金大哥自1997年退伍以来，一直投身于公益事业。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从原先观望漠然的态度到积极参与村级的公共事务中，唤醒村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乡村文化氛围。例如，近年来，在金大哥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一支由13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伍，队伍成员囊括了理发师、民警、幼师、护士等职业，主要针对组内老年人开展理发、量血压、磨剪刀等常规性的志愿服务活动。同时，他们在邻里纠纷调解、邻里互助、邻里文明劝导、邻里民情收集、邻里安全巡防、政府政策宣传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3.2 整合资源，打造自治“微阵地”

新乡贤以其勤劳、正派、有技能或有知识而深受村民尊敬，也让他们有能力整合有限分散的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而发挥更好的效用。金大哥以自己的家作为组内村落驿站，组织农户在村落驿站开展议事、学习、宣讲等。后在镇政府的帮助下，成立金大哥工作室，并以此作为“微阵地”，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全方位开展民意收集，并根据村民诉求对接各类资源，从而为村民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例如，金大哥为村民发放“便民卡”，罗列“金大哥工作室”志愿者的联系方式及服务内容，让有需求的村民能第一时间联系上志愿者，对接资源，有效满足村民需求。此外，金大哥通过走访发现组内有4户人家存在“因病致贫”的问题，随后他与卫生院对接，积极与村委联系，通过金大哥工作室在村里开展针对老人的体检和医疗卫生讲座等活动，向他们宣传医疗卫生方面的知识，精准对接村民需求。

2.3.3 反馈民情，拓展诉求“微渠道”

村委会的日常工作都是围绕镇上的中心工作来开展，但是由于开展的工作是自上而下地向村民推行，并不能充分满足村民的需求，所开展的工作也可能不是村民真正想要的，从而导致村级层面推行工作的过程中存在重重阻碍。新乡贤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走访、村民议事会、座谈会等途径，能够较为及时地发现村民的主要矛盾和诉求，收集村民意见，并将其反馈给村委，帮助解决突出问题，扩大村民表达自己利益需求的渠道，为村级重大决策建言献策。例如，金大哥作为退役军人的代表，为村里的退役军人召开座谈会，既向他们介绍了村里退役军人工作的基本情况和未来的工作计划，也了解到了他们对于村里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活动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增强村内退役军人们对彼此和村级事务的认同感，激发其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2.3.4 提供服务，增强治理“微效能”

新乡贤根植于乡土，与村民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解村民的所思所想，能够针对村民多元化的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从而提高基层治理成效。金大哥工作室通过结合组织特色开展活动，调动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同时，对村民开展宣传教育，帮助村民了解政策，促进政策的推行和落实，推动组内“微范围”的有效自治。金大哥工作室作为公益创投项目获得平湖市首届社区“微治理”创新项目大赛决赛二等奖。此外，金大哥根据走访，绘制微网格户图，详细记录了自己所辖组内每户村民的基本信息，例如工作单位、学历，反馈的问题及解决方法等，从而结合可视化地图针对村民需求开展邻里服务，提高基层治理“微效能”。

3 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的启示

3.1 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需要党建引领

坚持党建引领是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前提。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新乡贤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党建引领。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是对村“两委”工作的补充，并助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村级党组织通过吸纳优秀新乡贤，发挥其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3.2 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是乡村文化的重构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撤村并居方兴未艾，由此引发了村落的“空心化”、乡村文化“荒漠化”、乡村集体“失忆”乃至“断根”的现象^[15]。同时，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农民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也趋向理性化，农村由熟人社会走向了半熟人社会^[16]。新乡贤在参与村庄“微治理”的过程中，作为村民的代言人、发言人，表达村民多元化的“微需求”，从而为村民提供更为精准的公共服务。在这过程中，新乡贤以其声誉威望，教育教化了村民，转变他们的价值取向，并且感染更多的村民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改善社会风气，重新构建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乡村文化氛围。

3.3 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仅仅依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不仅会造成提供速度上的低效率，也可能从种类上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多元化的需求，甚至可能得不到村民的认可和响应。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承接或协助了原先由基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缓解了这方面的矛盾。原来由政府管的事情，由新乡贤来协助承担，有效减轻了政府的负担，缓解了政府的压力，降低了政府治理的成本，促进了政府角色的转变。

3.4 新乡贤参与村庄“微治理”扩大了基层民主自治

农村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社会主体，而这些社会主体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各社会主体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新乡贤往往会比村委会更早发现村民之间的矛盾和问题，然后将这些矛盾和问题反馈给村民小组长或村委会，表达村民的真正诉求，并且由于其本身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能够较好地扮演起矛盾利益调解员的角色，帮助村民解决矛盾，扩大了村民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另外，新乡贤还可以通过提供便民服务，起到带头作用，营造互帮互助的良好村风，唤醒村民的民主意识和自治意识，让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本村的公共事务中来，从而推动基层民主自治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共产党员, 2017(21): 4-25.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J]. 前进, 2021(12): 10-33.

[3] 章荣君. “微治理”: 基层社会矛盾源头预防的有效机制——基于常熟市H社区“微治理”的案例分析[J]. 理论与改革, 2017(4): 51-58.

[4] 中国文明网. 刘奇葆: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EB/OL]. http://www.wenming.cn/syjj/tt_syjjq/201409/t20140916_2179779.shtml, 2022-01-15.

[5]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1): 20-29.

[6] 钱念孙. 乡贤文化为什么与我们渐行渐远[J]. 学术界, 2016(3): 38-44.

[7] 吴晓燕, 赵普兵. 回归与重塑: 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J]. 理论探讨, 2019(4): 158-164.

[8] 王杰.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6): 119-128.

[9] 刘奇葆.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J]. 党建, 2015(9): 18-21.

[10] 郑涛, 王文轲.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的时代要义与培育路径[J]. 中国农村研究, 2019(1): 74-86.

[11] 李思琪. 新乡贤: 价值、祛弊与发展路径[J]. 国家治理, 2018(3): 28-36.

[12] 张兆成. 论传统乡贤与现代新乡贤的内涵界定与社会功能[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2(4): 154-160.

[13] 赵浩. “乡贤”的伦理精神及其向当代“新乡贤”的转变轨迹[J]. 云南社会科学, 2016(5): 38-42, 186.

[14] 王琦. 新乡贤融入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23(S2): 59-63.

[15]鲁可荣. 乡村集体记忆重构与价值传承[J]. 民俗研究, 2021(3): 62-70, 158.

[16]贺雪峰. 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散论[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5(3): 72-78.